《清史编年》的新收获

——读《清史编年》第五卷《乾隆朝》上

高　翔

《清史编年》，迄今已出版了四卷（第一、二、三、五卷），由郭成康先生负责编写的第五卷《乾隆朝》上（以下简称“乾隆编年”），充分反映了近年来作者对乾隆及其时代研究的新成果，同时，在编纂手法上，对传统编年体裁也颇多突破与创新，为近年史学论著中的上乘之作。

古代中国，乾隆时代无疑是最引人注目而又意味深长的历史时期之一。一方面，传统社会达到了它最辉煌的顶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全盛”奇迹，即所谓“德业于今臻盛大，直超三五辟鸿蒙”（于敏中《素余堂集》卷二）；另一方面，正是在“极盛”与“盛满”的莺歌燕舞中，中国落后于西方诸国完全成为定局，近代史上落后就要挨打的命运其实在康乾盛世业已铸成，这，可以说是十八世纪中国，尤其是乾隆时代的悲剧意义所在。

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乾隆时代的研究水平与该时代在中国历史演变中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极不相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客观社会条件的限制，乾隆时期历史状况的异常复杂外，最重要的就是：基础研究没有跟上，许多重要历史资料（尤其是档案材料）未被发掘利用，一些重要人物的生平及社会活动未被全面揭示，这个时代的基本演变脉络也没有被清晰而准确地展现出来，从这个角度讲，郭成康先生的“乾隆编年”正好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为人们进一步深入考察乾隆及其时代提供了一份简明而又充实的参考资料。

“乾隆编年”按时间顺序，记述了清朝从乾隆元年到三十年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以及有关人物的生平活动，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这就要求作者具有广博的历史知识，扎实的史学功底和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从专著编写情况看，作者为此付出了巨大劳动。参考、引证的史籍几乎全是第一手材料，许多材料也是第一次使用。以档案为例，《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系台湾出版的乾隆朝档案史料汇编，大陆学者以前很少使用，而在“乾隆编年”中，它却作为基本史料被多次引证。至于乾隆朝《上谕档》、《汉文起居注》、《军机处录副奏折》、《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等，在研究乾隆的论著中，也是第一次被大量引证。档案材料的充实，不但大大提高了编年叙事的可靠性，而且使作者能够用最权威的资料，对许多历史事件作出新的分析与考订。例如，作者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中，发现了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徐嗣曾关于天地会创立情况的奏折，为天地会创立于乾隆二十六年之说提供了更加直接的证据。又如，关于阿睦尔撒纳去世时间，过去一直认为死于乾隆二十二年九月（南京大学历史系编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即持此说），作者查考、对比有关历史档案，对这一说法作出纠正，指出：九月，系俄历，准确时间为公历十月二日，农历八月二十日。

除了档案外，该书还大量参考官书、笔记、方志、国内外有关历史文献汇编，以及史学界权威性研究成果，取材广泛，取舍精当，具有较强的资料性。

由于在专制条件下，“国家的繁荣昌盛，仅仅系于一个人的性格，这就是君主国的命运”（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第233页），因而研究清代历史，有必要充分重视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个性，思想与情感。“乾隆编年”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尝试，作者注意从乾隆思想倾向的变化，追寻当时政治面貌之成因。例如，言路是影响乾隆前期政治的重要问题，该书几乎摘录了乾隆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全部论点，以揭示乾隆“广开言路”的真实内涵。此外，作者还结合乾隆统治思想对一些典型政治事件作了分析，如在叙述乾隆七年仲永檀泄露留中密折遭重处一事指出：初政以来，鄂尔泰、张廷玉两大派系矛盾激化，给乾隆以极深的触动，促使他借机惩戒朋党。在分析二十年乾隆文字狱时指出：“是时帝必欲遽兴大狱，以震慑汉大臣官员，胡中藻．谢济世不过是其早已选中的靶子而已”（“乾隆编年”第511页），也许有的读者不会同意这种观点，但任何新思想的提出都是发人深思的。

虽说编年应当反映社会历史之总面貌，但它毕竟不是百科全书，在具体编纂中不能不有所取舍，有所侧重。乾隆编年”在注意从宏观角度反映社会整体状况的同时，又注意从微观的角度，比较具体地介绍了一些对当时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例如，禁矿还是开禁，是雍乾之交经济政策的一大转折。雍正在执政十三年中，除对滇铜及百姓日用所需煤炭允许开采外，严禁民间大量经营采矿业。乾隆继位后，对这一政策作了调整。“乾隆编年”对当时政策转变过程，特别是对弛禁与严禁两派大臣的意见，乾隆在两派大臣影响下摇摆不定的态度有比较祥实的记叙。此外，对河工、海塘、铜政、户部存银、每年收支、捐纳各省驻防等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事务，均有十分具体的记述。尤其是户部银库收支、历年所办铜斤，均逐年开列，并有分析说明，从量化的角度反映了清政府财政及铜业状况。而添载的清朝满、蒙、汉及绿旗各镇协官兵俸饷及折给粮米、马匹、料草等项军需开支，源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户科题本》，是关于清朝军费开支的权威性材料，对了解清朝军事政策、财政支出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我国，编年体史书起源于春秋，两千年来源远流长。编年体史书的最大特点是按时间顺序排列各个时代的重大事件，从纵向的角度展现历史演变的客观进程，这是其所长，也是其局限性所在。因为编年体以年、月甚至日、时系事，这就往往将同一事件割裂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使人很难客观、迅速而且方便地把握某一历史事件的总过程。正由于编年体具有上述缺点，所以南宋袁枢创立纪事本末体，将每一历史事件独立成篇，各篇又按年月顺序编写，以便完整地描述同一事件的全部经过。“乾隆编年”虽系编年体史书，但不局限于体载限制，在编写中注意吸收纪事本末体所长，有意识地将一些重要事件的经过集中叙述。如乾隆十三年苏州暴发聚众哄闹、抗官抢犯事件，作者即于“四月二十四日”、“五月初十日”两条中全面介绍了这一事件产生的原因，前后经过及清廷处理办法。在叙述乾隆十六年伪稿案时，作者在“八月初五”一条中系统介绍了伪稿出现的起因、内容以及地方官僚和乾隆皇帝的最初态度。对时间跨大较大，不可能集中叙述者，作者也注意相关条目间的上下联系，使其显得紧凑衔接，以保持历史事件的联贯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编年体裁之不足。

以往编年体史书大多仅叙史事，作者很少加以评论，虽说有所谓“春秋笔法”，“笔则笔，削则削”，“以一字为褒贬”，然能明白其“微言大义”者，不过学问中人，至于能步

其后尘，加以效法者更是凤毛麟角。因而今天见到的编年体史书，如蒋氏、王氏《东华录》等，几乎是清一色的就事叙事，尽管通过序言、材料取舍等途径能看出作者总的是非倾向，但就史书正文而言，读者很难清楚了解作者对某一具体事件的专门看法。“乾隆编年”不同，它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不拘一格，直抒己见。比较典型的如：乾隆六年，户部侍郎梁诗正以财政拮据，入不敷出，建议将在京八旗闲散人丁分置边屯，裁减绿营冗额。作者对此发表评论说：“乾隆即位以后，户部银库存银在三千万至三千四百万两上下，且有日渐减少之势，而每年为维持八旗、绿营则开支二千四百万至二千五百万两。梁诗正从裁减军费入手以解决财政窘迫问题，的确抓住了要害”（“乾隆编年”第116页）。过去，一些史家忌讳对史实直接发表议论，认为这样做有损史书的真实性。其实，有损史书真实性的是脱离历史实际的空谈，在理性原则指导下基于客观材料的分析与评论，其最大作用就在于揭示历史的真实，或帮助人们认清历史的真实。

和传统编年史书比起来，“乾隆编年”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凡涉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对有代表性的观点均予介绍。如在叙述和田六城赋税时，涉“塔里雅沁”一词，作者注释为“种地佃户之意”，同时指出：还有一种解释，塔里雅沁为准噶尔时代从天山以南迫迁到伊犁河上游进行农耕的维吾尔农民。在叙述天地会创立时，作者介绍了关于天地会创立时间的多种看法，指出除乾隆二十六年之说外，还有康熙甲寅说、雍正甲寅说、乾隆三十二年说等不同观点。关于曹雪芹去世日期，作者特别说明：“大概有两种说法，一说卒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一说卒于二十八年除夕，此处取后一说法”（“乾隆编年”第733页）。介绍有争议的各种观点，不仅使读者能了解有关问题的研究现状，而且也有助于启迪思想，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

为重要人物立小传，是《清史编年》的一大特色，“乾隆编年”在这方面着力颇多。几乎每一重要历史人物，无论是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还是学问家，只要生活于乾隆朝，均立传志其生平，介绍其生卒时间、籍贯、人品性格、思想观点、平生遭遇、历史功过等，笔墨不多，但内容全面，叙事虽简，但详略得当，为读者迅速了解乾隆时代社会人物，提供了方便的检索窗口。

在肯定“乾隆编年”取得的上述成就时，也需指出：作为一部开拓性史学著作，该书也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例如，在叙述乾隆初年纠正雍正严猛政治的各种措施时，似乎有必要介绍他对以“残忍刻薄”著称的山东文登知县王维翰的处理，因为这和处分许容、王士俊一样，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案发较早。在分析乾隆欲将谢济世作为文字狱靶子时，最好能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谢济世是雍正以来极端君主专制的反对者，他曾上疏要求改变密折制度，痛斥雍正统治为“汉唐杂霸之治，而非二帝三王之治”，与乾隆维护君主独裁权威，进一步加强对臣僚思想控制的作法发生了严重冲突，以致必欲置之于法而后快。当然，对以反映整个社会历史面貌及其演变过程为目标的编年体史书来说，将类似上述两点的问题视为缺陷，就未免失之苛刻了，作为一部功底扎实，富有新意的史学专著，“乾隆编年”的学术价值无容质疑。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即将完稿的下卷，笔者抱有同样的期待与信心。